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人工智能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解读

徐 璐 朱炳元

【摘 要】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视智能革命带来的“无人工厂”的出现、“无用阶级”的断想以及人的异化的各种新情形,可以确证:人工智能作为人的脑力的延伸无法取代和超越人的社会主体性和历史主体性;价值本质没有改变,但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内容和形式展现出新的特点;价值规律依然发挥作用,并一直为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进步提供强大推动力。作为历史的、阶级的、批判的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指引人们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和藩篱,使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共产主义实现和人类自由解放的物质力量。

【关键词】人工智能;劳动价值论;劳动

【作者简介】徐璐、朱炳元,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沪),2022.2.59~6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A006)。

当前,人工智能已悄然拉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序幕,在各个领域加速布局,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形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实践的深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科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生动具体的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石的劳动价值论,是否能回应和阐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现象,是否能指引社会发展迈向共产主义自由解放的理想通途,是其理论价值的体现,同样也是检视和确证其生命力与真理性的现实必然。

一、从体力的延伸到脑力的延伸:人工智能的产生与发展

人工智能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依托互联网、大数据,通过算法或运算结构模拟和再现人类思维及智能行为的一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涉及数学、计算机科学、哲学和认知科学、神经生理学、信息控制论等,其实际应用包括机器人、语言和

图像识别、专家系统等多重领域。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迅猛,与基因工程、纳米科学并称为三大尖端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由于其类人和超人属性引发对人类秩序的忧虑和思考:人工智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古猿通过劳动脱离了低级单纯的动物状态进化为人,人从自然界中分化独立出来,同时也是通过劳动,人与人类社会同自然界又紧密地联系起来。人的劳动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马克思从分析劳动过程及其发展演变入手,提出各种技术从本质上来说无非是人体器官的延伸。“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做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1]人体的各种器官是最原初的劳动工具,为了增强放大器官的功能、

减轻缓解器官的痛苦,劳动者在人力工具、畜力工具和自然力工具的探索上一直未曾停止。

在马克思所处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类社会探索的主要是如何延展人的肌肉系统,解放人的体力。20世纪发展起来的人工智能相较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时代的机器,依然是辅助人们提升劳动能力的工具,而不同之处在于它在代替部分体能的同时,更将器官延展的对象拓展至人的大脑。人工智能从诞生开始就致力于将人类的智能可视化,通过数据计算的形式模拟人的意识活动和大脑思维,因此人工智能本身也必然具备一定程度上的人类气质和“类人属性”。它可以与外部环境的行为、语言、图像、文字、声音甚至是情感进行交互并作出回应,如日常生活中的车牌识别、人脸识别、对话式智能家居、无人驾驶汽车等。人工智能甚至因其独有的超强技术手段,在一些特定方面和领域“碾压”人类的智能,表现出超强的记忆力,甚至是分析思考能力、逻辑判断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即展现出“超人属性”。2016年,阿尔法狗接连战胜九段围棋高手李世石和柯洁。同年,阿里人工智能设计师“鲁班”首次服务“双十一”,制作1.7亿张商品展示广告,若是一名人类设计师要9000年才能完成。不久前,清华大学迎来国内首个原创虚拟学生“华智冰”,她拥有持续的学习能力,能够逐渐“长大”,她所代表的正是由感知智能时代向认知智能时代迈进的前沿方向。以上情境中,人工智能起到了模仿和延伸人的智能的作用,完成的是需要人类或简单或复杂的智能使用才能完成的任务,又通过“芯片”的高效稳定处理,克服了人在进行计算等重复性、连续性、单调乏味的信息处理活动时的低效和易错以及由情绪波动所带来的结果不稳定性,从而达到更快、更好、更轻松地处理劳动对象的目的。

劳动使人成为人,虽然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

替代本身并没有与过去的各种技术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人类自身器官的模仿、延展,但是工具和机器还仅仅是取代人的体力劳动,智能机器则因为其快速的信息处理能力而逐渐取代人类的脑力劳动,其类人和超人属性使劳动工具与劳动者有“合二为一”的现实可能。这不禁让人们开始惶惑:人工智能是否最终会彻底取代人类的劳动功能,人的主体性是否将匍匐于人工智能之下?答案是否定的。需要明确的是,人工智能与人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在某些领域人工智能对人类运算、存储、记忆等能力表现出了替代和超越,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整体地取代人。人工智能的思维模拟并不是人类思维本身,两者“思维”的物质承担者不同,人工智能模拟的范围也仅仅局限于部分有限的功能。人工智能相比于人类思维目前主要是处于无意识的机械过程,无法实现与人的情感、意志、心态、情绪、经验等方面的自然交互,本质上人工智能仅仅是物质世界范畴的概念,无法跨越到意识领域。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工智能不具有社会主体性,它具有的是社会工具性。有部分人忧虑从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发展至超人工智能时,机器人将取代人,人的主体性将让位于自己所设计的技术物。我们有理由相信,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对抗,在深层本质上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技术的异化使用应该纳入人工智能伦理和治理的考察范畴,它不单是科学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的论域,并且一旦当人类科技的发展使这种对抗具有现实可能性,显然后者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问题解决的重点和关键所在。

二、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人工智能创造财富的本质分析

人工智能时代出现越来越多的“无人工厂”“无人车间”,这些智能革命驱动下的“无人工厂”“无人

车间”使企业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数量不断减少,而企业所获利润却不断增加,所形成的活劳动在相对减少而价值量却在不断增加的“此消彼长”矛盾,不禁使人们再次审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随着生产领域工人的“离场”,人的活劳动还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现在距离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已经有了巨大变化,但若仅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无人工厂”的表面现象认定,机器、技术等生产要素也和劳动一样是价值的来源,那么又会倒退回百年前马克思早已批判了的萨伊等人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陈旧问题。智能手段运用于企业生产过程所“表现”出的更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实质,并不在于人工智能创造了价值和使用价值,而是由于劳动形式和劳动效率的改变,由于社会化生产环境下生产交换的本然规律。价值的来源依旧只有一个,即人类一般抽象劳动,更精准地说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

从劳动主体方面看,人类劳动依旧“在场”,我们可以从“总体工人”视角认识“无人工厂”中劳动者状态的转变。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就从机器生产的劳动分工中预见到,随着未来科技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直接的、分工的、个体的生产将会转向间接的、总体的、整合的生产。“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2]使用人工智能设备的无人生产车间中直接参与生产的工人越来越少,但我们不能忽略背后操作这些先进技术设备的专业操纵者和管理者,并且“无人工厂”只是

企业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而支撑生产过程的背后是庞大的科研和管理队伍。与“无人工厂”中人的“退场”同时发生的,是大量的价值创造过程从车间转移到了研发办公室,科研和管理人员为研发新产品、改进工艺流程、创新技术应用,夜以继日、攻坚克难,投入大量智慧和汗水的技术性和革命性劳动。因此,劳动依然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无人工厂”的利润来源于劳动,剩余价值的创造一部分由参与直接生产过程的操作者的劳动形成,更大的一部分是背后科研和管理人员被隐藏起来的“真实劳动”。

从劳动的内容和形式看,人工智能视域下复杂劳动将成为活劳动创造价值的主要形式。人工智能环境下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都发生了数字化转型,作为合格的劳动者必然要增强数据信息搜集、加工、分析、挖掘的能力,以往只需要简单调动逻辑判断的、机械重复的工作渐渐地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人们更多从事需要创造性研发、情感交互性沟通的复杂劳动。美国学者迈克斯·泰格马克认为,人们在选择未来职业时要思考以下三个问题:“1.该工作是否需要与人互动,并使用情商?2.该工作是否涉及创造性,并涉及更聪明的解决方案?3.是否需要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下工作?”^[3]越趋向于“是”的职业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概率越小,而这类复杂劳动能在单位时间内对象化为更多的价值,从而形成更高的利润。

从商品价值形成的构成看,人工智能属于物化劳动,它作为生产者抽象劳动的转化媒介更高效地实现价值转移和辅助价值生产,而在最终价值形成过程中表现为活劳动份额的减少,过去劳动份额的增加,但整体上是总体劳动量的减少。人的劳动和人工智能的“劳动”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工智能只是人的脑力的延伸而无法取代人的主体性。与蜜蜂建

筑蜂房、蜘蛛织网一样,人工智能的“劳动”是无意识的,“智能机器的主体与能动作用只不过是人们以技术形式赋予自身活劳动的新形态,是以机器的智能表象去体现活劳动的流动特征”。^[4]马克思根据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产品价值形成或者说价值增值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指出了资本的两种流向: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人工智能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体,作为物化劳动属于不变资本,人工智能作为劳动工具参与商品生产的过程并非价值增值,只是分批次地将本身贮存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之中,并且转移到商品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在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5]现代企业人工智能设备的大量装备,使两种资本之间的有机比例升高,商品价值的形成更多来源于过去的劳动,即物化劳动的转移。总体而言,随着人工智能的普遍使用,社会生产率的提升将带来单位产品的价值量下降,这意味着单位产品包含的劳动量的减少,劳动力的节省意味着人们也将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发展自我的自由劳动。

跳脱出个体生产,站在社会化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总过程角度来看,分割全社会劳动创造的总体剩余价值,是人工智能企业获得价值和利润的重要途径。各生产部门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或资本周转速度不同,其利润率是不同的。因为市场竞争和资本的逐利性,资本将由利润率低的部门转向利润率高的部门,最终到各部门能够大体上形成平均利润率,以实现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因此,实际上剩余价值在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分配也并不以活劳动的量为标准,而是受到平均利润率的影响在各部门、各企业之间进行分割。马克思指出:“不管一个产业资本的构成怎样,不管它推动的是1/4死劳动,3/4活劳动,还是3/4死劳动,1/4活劳动,以致在一个场合比在另一个场合吸收大两倍的剩余劳动,生产大两

倍的剩余价值……它在这两个场合都会提供相等的利润。目光短浅的单个资本家(或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全体资本家)有理由认为,他的利润不只是来自他所雇佣的或他那个部门所雇佣的劳动。这就他的平均利润来说完全是正确的。”^[6]“无人工厂”也许因为人员的减少,由活劳动形成的剩余价值较少,但是它可以凭借投入较大量的资本在生产交换过程中获得平均利润,即从社会总体剩余价值中分割到利益。

当然,“无人工厂”无法通过一般利润率获得高于同行业其他未配备人工智能设备的企业的利润。“无人工厂”的较高利润率来自从社会总体剩余价值中分割到的超出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的来源便是企业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实现与个别企业在整个行业中率先使用人工智能进而提高个别生产率,利用价值规律实现商品生产交换有密切的关系。

三、价值规律:人工智能的利润来源和发展动因分析

所有的社会经济现象中都具有普遍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都遵守一定的运行规律和法则,价值规律就对社会化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起着支配作用。价值规律的核心内容是商品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是由抽象劳动形成的,因此价值量也必然以包含在其中的劳动量来计算,而劳动的量以时间为计量单位。同一件商品往往有许多劳动者和不同企业同时在生产,他们的生产条件有好有坏、劳动力有强有弱、熟练程度有高有低、管理和运营水平参差不齐,这都会影响到劳动时间的计量。如果商品的价值量是根据个别价值量计量,那么就会出现劳动者或者企业越不严格自律、生产条件越落后、技术水

平越低、管理水平越差,其所使用的劳动时间就越长,商品价值量就越大,等价交换后获利更高的荒诞现象。所以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可能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马克思这样阐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7]可以看到,影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因素既包含了主观方面也包含了客观方面。其中“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属于客观因素,是指现时某一生产部门大多数产品生产已经达到的技术装备水平,这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史,从采集狩猎时代到畜牧农耕,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现阶段信息时代,不同的生产工具带动产生璀璨各异的时代文明。如今智能工具成为信息社会典型的生产手段,它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降低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比如,2015年腾讯财经推出的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能根据算法在第一时间自动生成稿件,瞬时输出分析和研判,一分钟内就能将重要资讯和解读送达用户,这样的工作效率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发展起来之前是绝不敢想象的。生产部门技术革新本身影响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它也通过影响劳动熟练度、劳动强度、劳动复杂度、劳动管理方式等其他主观因素,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产生影响。生产同种商品的生产者由于生产的主客观条件不同,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也会存在差异,以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各生产主体生产成果的衡量尺度,一方面承认个别劳动时间差异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通过等价交换原则,发挥择选淘汰、促进生产的作用,推动劳动者努力改善主客观生产条件。

现实中,如果某一生产者首先掌握和采用了先

进的技术装备,该生产者在同样的时间内将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使用、生产条件的改善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率,一方面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得到增长,另一方面虽然缩短了个别劳动时间,单位产品的实际价值量下降,但根据价值规律,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并不是这个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在市场交换之时并不是以个别价值量进行交换,而是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等价交换。在新的技术装备普及化之前,率先采用先进技术装备的生产者仍然可以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标准,以本身较低的价值量交换获得较高的价值量,实现自己商品的价值,从而在利润转化为一般利润之时获得超额利润。不仅如此,超额利润也同时为其赢得了以降价换销路的空间,只要他以比其他竞争者低的价格销售自己的产品,即使不能将竞争者完全排除,也可以争得一部分销路和市场。当某行业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配备人工智能“无人工厂”时,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一方面,高级工程师和管理者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其剩余价值率远高于一般简单劳动者;另一方面,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每个产品的个别价值虽然低于社会价值,却能与含有较多价值的商品“等价”交换,于是便从社会总体剩余价值的分配中占了较大的份额。这种价值增量其实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形成的价值分割现象,而并非人工智能创造了价值。

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价值量,并按照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规律迫使每个生产者为了争得各自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不断地改变原有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螺旋式上升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是一

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抛出原先的轨道,并且因为资本已经加强了劳动的生产力而迫使它继续加强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8]现实中个别企业垄断生产技术的特权不会长久,其他竞争对手也会紧随其后创新手段、优化分工,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普及使社会平均生产效率得到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别就会缩小直至消失,于是价值规律将推动开启新一轮的技术竞争。市场调研机构高德纳2019年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企业人工智能应用近年来高速增长,全球采纳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从2015年的10%增长至2019年的37%,增长率高达270%。在企业应用人工智能高速增长的同时,人工智能已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激烈博弈,世界各国争相制定人工智能国家发展战略,以国家力量抢占人工智能竞争制高点,以求在日益激烈的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导权。

量变终将引起质变,这个过程的循环往复,将使生产某一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单位使用价值中包含的价值量也会相应持续减少,消费者就能够以较小的代价获得丰富的产品以满足需求。一旦当包含在单位产品中的劳动量低得微不足道从而无法计算的时候,价值规律也就会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伟大时代即将到来。“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

式。……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9]由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发展将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人类社会交换形态迈入共产主义的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积累物质条件;为人们摆脱作为谋生手段的强迫性劳动的束缚,按照自己的意愿、爱好、需求自由地劳动,让自身的体力、智力得到自然地健康地舒展,从而成为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准备条件。

四、共产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指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走向

从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到现在的信息时代,历史的滚滚车轮向世人展现着生产力的发展是如何极大地改写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推动着人类迈入一个又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过往历史上科学技术的革新与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很相似,都遵循着“生产—技术—科学”三者之间循环促进的逻辑框架,但他们的发展节奏却不可同日而语,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更新速度、生产提升效率将会远远超过前几个阶段的技术革命。人工智能的技术浪潮迎着新世纪的曙光蓄势待发,它将会为社会带来更加猛烈的转型过程和更加深刻的社会影响,其现有的以及未来不可预测的强大生产力最终将会把人类社会带往何处值得深思。

不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的探求,都是为科学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提供科学理论武器的支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终旨趣和根本诉求在于将人从一切“异化”的或“非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高级阶段,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必备的物质基础,人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时劳

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充分展开自身丰富的本质,拥有充裕的时间来从事和发展个人的才智、体力、品格、个性,个人的能力得到最大可能的提升,个人的自主性、创造性、独特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个人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普遍而丰富,人将成为越来越具有全面性的人。

精细化、人性化、智能化的智能革命无疑给社会迈向这样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阶段带来了最好契机。借助大数据、云计算、深度学习算法、神经网络芯片,人工智能将智力、工具、动力三者完美地融合为一,把逻辑智力优势和工作操作优势联结起来,以高于人类的工作速度、优于人类的工作精度、胜于人类的工作态度、强于人类的工作耐力,在一些危险场合、极端环境以及社会认知中的底层边缘领域,做劳动者“不能干”“不愿意干”“干不好”以及可以“干得更好”的工作,为人类生产出源源不断的巨额财富。人们不用再为生计而被迫劳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再成为束缚人类自由发展的枷锁,发达的生产力给人类腾出充分的闲暇时光,人们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爱做的事情,在劳动中享受、在劳动中收获、在劳动中充盈。

社会历史充满了辩证法。人工智能带给人类希冀的同时,“机器排挤人”“机器统治人类”“机器奴役人类”等社会焦虑情绪也不断蔓延。比如,霍金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就相当保守,虽然对目前人工智能带来的很多便捷不可否认,但他也曾向英国《独立报》表示:“人类必须建立有效机制尽早识别威胁所在,防止新科技(人工智能)对人类带来的威胁进一步上升。”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曾接受纪录片《你相信这台计算机吗?》的采访时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可能创造出“一个不朽的独裁者,人类永远都无法

摆脱其统治”。随着人工智能的智能化水平从感知领域迈向认知领域,写作机器人、财务机器人、播音机器人、机器人设计师、资讯机器人层出不穷,不仅是以往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今后行政职位、创意行业、法律助理等都可能被人工智能所代替,“从表面上看,人工智能让人类失去的仅仅是工作,但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人工智能对人类作为唯一劳动者以及人类劳动权的挑战”。^[10]一旦真的失去劳动机会,人类将陷入变为“无用阶级”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家国外公司使用算法监控员工,以算法结果为依据解雇了上百位“不敬业、效率低下”的人员;某市政部门给环卫工人配备智能手环用来定位查岗;外卖骑手被“数字控制”不断突破劳动极限等案例屡见不鲜。这样,被认为会极大提高劳动效率、极大解放劳动力的高科技人工智能,就悖论性地成为增大劳动强度、压迫劳动力的异己力量。此外,脑机接口技术等除了“侵入性”植入物的安全健康风险,其伦理问题更使人忧虑,开颅、插芯片以异物“扰动”或者说“控制”自己的神经冲动,挑战着生物世界的自然秩序。总体来说,人工智能在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很多安全隐患,其潜在风险一方面聚焦于威胁人类自身基本权益的保障,包括生命与健康、尊严与隐私、安全与自由等,另一方面在于模糊和消解着人类对自我认知的建构和对自我价值的确证。

但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作为生产力的人工智能科学技术本身,症结在于生产关系。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取正常工作日和提高工资,而到了大机器生产时代,“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为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11]因为机器排挤,失业工人对机器“恨之入骨”,当时工人奋起反对劳动资料,焚毁砸坏机器甚至杀害机器发明者,这表明工人还没有把机器和机

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区别开来。在马克思的研究视野里,这两者是相互区别的:“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12]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制度方面对“劳动异化”进行了剖析,“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13]人工智能就其本身来说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的物质手段,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却成为剥削劳动者、排挤劳动者、奴役劳动者的反动力量。

人类加速走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历史趋势势不可挡。技术本身只是决定人工智能发展轨迹,以及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影响的一个方面,人工智能这一技术的社会形态演进所蕴蓄的变革力量是否能成为开启共产主义之门的锁钥,是否能成为撬动人类文明跃升的杠杆,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在先进的社会制度中被应用。^[14]我们应该抱着积极主动、开放理性的态度面对人工智能,坚决致力于扼制“资本的逻辑”,破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藩篱。在经济上要全面稳固地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政治上要坚持不懈地推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在社会治理上要有效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治理方式。最基础的是要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让信息、知识、技术等智能化社会中最重要生产资料

跳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宰制,由劳动者共有、共建、共享,让劳动者在学习和实践中积累足够的智能资本,摆脱因技术性失业而陷入“无用阶级”的现实困境。总之,“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并不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人工智能,将无产阶级当作新时代的‘卢德分子’,而是打破资本主义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垄断和占有,成为帮助无产阶级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工具”,^[15]使劳动真正成为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活动,共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

参考文献:

- [1][2][5][7][11][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9,582,237,52,495,508.
- [3][美]迈克斯·泰格马克.生命3.0: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进化与重生[M].译者:汪婕舒.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162.
- [4]刘伟兵.过时还是证明:人工智能时代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6).
-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0.
- [8][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37,622.
-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197.
- [10]黄欣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J].理论探索,2018(5).
- [14]王水兴.人工智能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思[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5).
- [15]蓝江.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6).